

医生群体是如何陷入「道德困境」的

■本报记者胡珺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4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实名揭露部分三甲医院存在的肿瘤治疗乱象,直指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以及监管的缺失。这次曝光不仅引爆了舆论,也让医患关系陷入紧张。

这不是医生第一次被打上“不道德”的标签,事实上,他们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不道德”的职业群体,因为公众认为他们将经济利益置于患者之上,这是公众最在意的医疗难题。

可与此同时,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对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也就是医生而言,他们又面

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他们为什么会集体选择一种“不道德”行为?这种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支持?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姚泽麟看来,这是医学社会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

姚泽麟从博士阶段就开始了中国医生职业伦理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当代中国城市医生职业自主性的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正是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医生为什么成了一个“不道德”的职业群体?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北医三院医生揭露肿瘤科治疗乱象这一新闻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

姚泽麟:有这类事件的存在,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新闻里,它对整个医患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去年,我在与一些肿瘤科医生的交流中发现,患者对肿瘤科医生的不信任情况是比较普遍的。这也导致了肿瘤科医生在执业中普遍面临的一个伦理困境,就是当医生在向患者或者家属介绍或者“推荐”一些较新的治疗方案或者药物时,会有所犹豫,因为不少患者及其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你想挣我的钱”。

《中国科学报》:社会学是怎么看待医生群体中的“不道德”行为的?

姚泽麟:从我田野调查中所接触的医生来看,大部分医生都是有底线的,并不会完全舍弃医疗作用以换取经济利益。但是,这个群体所认同的职业伦理观也许已经和过去“行医等同于行善”有所不同了,他们是在有限度地接受理想中的职业伦理观。

社会学中对伦理的研究不少,我们会发现,伦理道德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过去40年间,社会上普通人的道德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医生这个职业也正在经历一个世俗化的过

程,世俗化的过程也是商业化的过程,医生的道德责任相对弱化了,而把自身利益看得更重了。

不过,老百姓常常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夹杂着非临床的考虑,甚至是非临床的考虑凌驾于临床考量之上,简单归结于“道德滑坡”,甚至在曝光帖中,医生自己也是这么分析问题的。

可他们都忽略了,当整个医生群体或多或少都存在对经济利益考量的事实时,这种行为的根源就必须从系统结构中去寻找。

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长期以来承受着来自患方的不满、怨言甚至愤怒,但我们却很少把研究的落脚点放到医生身上,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正是社会学所要关注的。

《中国科学报》:您说过,医生执业动机和行为的改变其实在医疗卫生体制的变化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所以,这才是导致医生“不道德”行为的根源?

姚泽麟: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国城市地区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此之前,公费医疗、劳保医疗解决了大部分城镇居民的医保问题,而且当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级诊疗体系,公立医疗机构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作为全额拨款单位,医院和医生很难产生逐利的动机和行为。

可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过重,国家—单位医疗保障制度就逐渐瓦解了。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医疗保障,他们在看病时就只能自己付费。于是他们处于“被动自由就医”的状态。表面上看,老百姓获得的就医自由越来越大,可以到任意一家他们中意的医院看病,只要他们能挂到号。于是病人们都涌向了三甲医院,使得那里每天都像“打仗”一样。这对分级诊疗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打击,无序就医的状况日益加剧。

这只是一个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公立医院开始了企业化改革。我国目前的公立医院就像是一个“怪胎”。一方面,我国的公立医疗机构从产权上来讲归国家所有;另一方面,公立医院所得到的政府财政拨款不足总收入的10%。在“自负盈亏”和“放权让利”的政策引导下,各级医疗机构的创收欲望被空前激发并被允许,以致身处其中的医生的趋利倾向变得空前严重。

两方面的制度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医生的执业行为以及医患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公立医院改革和医生执业行为之间具体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姚泽麟:医院自负盈亏,势必会要求提升医生的服务效率和经济效益。公立医院把国家给予自己的经营压力层层分解到各个科室,而各个科室又把这种压力分解到每个医生,于是,医院对医生的考核越来越精细化。

考核的首要指标是总收入,但是,仅有总收入还不够,医院还有病床使用率、病床周转率、平均住院日、收入药占比等等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源于医保部门对医院的考核,但同时也是医院在自负盈亏的现实下,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经济效益的内在要求。

考核指标为什么会深深影响医生的执业行为?因为与绩效“挂钩”。

医生的正式收入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在调查中,很多年轻医生告诉我,他们的绩效工资可以是基本工资的2-3倍。所以,从个人利益出发,医生不得不把经济收益纳入临床工作的考虑当中。

这当中还有一个不合理之处在于,在医疗体系里面医生的劳动是最不值钱的。能够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使得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不能有效反映医生的劳动价值。因此,医生只能通过向更多病人提供耗材、检查与药品来获取经济收益。这也是目前过度医疗的三个“重灾区”。

《中国科学报》:如果我们把医生的趋利行为都归结为不合理制度下的“被逼无奈”,恐怕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姚泽麟:当然,除了这种“强制”原因外,医生对于这些不合理制度安排的接受也有一些非强制性的原因。他们在这个体制中也是某种程度上既得利益者。面对行政体系,医生软弱无力,但在面对下游患者和上游医药厂商时却显得权力强大,很容易把行政体系的垄断转化为经济利益,满足公立医院的自负盈亏需要,同时也弥补自己正式收入的不足。

一方面,医生具有国家与社会所认可的职业权力,有垄断的处方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稀缺的医疗资源的看门人。而公立医院,特别是三甲

医院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为身处其中的医生诱导病人接受大量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医疗服务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首先,医生对患者保有优势地位,尤其是当医生面对一个原子化的患者群体时。由于目前分割的医疗保障计划使得我们缺乏一个有力的第三方来制衡强大的供方,医疗服务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权力极为不平等。一方是强有力的医疗执业者,面对患者,他们有着非常大的自由,现有的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规制他们的诱导需求行为;另一方则是弱势的患者,面对医生,他们不能辨别医生是否提供了适当的服务。

其次,因为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公立医院事实上成为了药品的销售终端,药企和医药代表对医生有所求,因此必须要讨好公立医院及其医生,使得医院和医生有条件从中获得一定的灰色收入。

对于这样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很多医生并不自知。针对这一点,政府似乎并没有实施严格的监管,客观上给医生从医疗服务中创造经济收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结果是,医生通过市场机制获得了经济收益的弥补,实际上也帮助国家减轻了医疗领域沉重的财政负担。

可是,这么做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医生被民众当作了一个“不道德”的群体,医患之间不信任,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最终,医生成为了医疗卫生体制的“缓冲器”和“替罪羊”。

《中国科学报》:有什么办法可以影响医院、医生的执业行为?

姚泽麟:一个职业的发展需要外部的制度依托,也需要内在的精神支撑。当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求医生在职业教育阶段和临床执业阶段加强并内化职业规范与伦理教育,提升自身的医学人文素养,而自治行业协会的创建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应当继续加大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担当。2009年新医改之后,政府的积极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各种医疗保险已经覆盖到几乎所有国民。

但是,正如医改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顾昕所说的,影响医疗卫生体制运行的,除了医疗服务的筹资模式外,还有医疗服务递送的组织模式。我们在筹资领域也就是医疗保障领域的诸多成绩并不能掩盖我们在递送模式领域的改革的滞后。

目前,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与放权让利的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由于公立医院的逐利动机以及医保制度无力对医生行为实现有效约束,我们现有的分级诊疗体系仍然形同虚设。三甲医院不断扩张,而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实,随着医保覆盖面的扩大和待遇的提高,患者无序就医的状态反而是在加剧的。这种状态的加剧,对医患关系无益,对于医生的执业环境更是没有改善作用。

所以,要限制公立医院、医生的逐利动机和行为,就必须让公立医院名副其实。政府应该提供稳定足额的财政支持,同时加强监管,而不是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导致公立机构最终从患者那里获取经济利益。不彻底改变这一点,再多的医保都无法满足公立医院的巨大胃口。这也是医改进入深水区的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过去40年间,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医生这个职业也正在经历世俗化即职业化的过程。

●公立医院开始企业化改革后,所得到的政府财政拨款不足总收入的10%,在“自负盈亏”和“放权让利”的政策引导下,各级医疗机构的创收欲望被空前激发并被允许,身处其中的医生的趋利倾向变得空前严重。

●很多医生不自知,因为有垄断的处方权,同时又是稀缺的医疗资源的看门人,医生也是这个体制中某种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明确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为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科学家精神六个方面的内涵,在“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身上都能找到有力的注脚。他是践行科学家精神的典范。

爱国

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一点在郭永怀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为了祖国的需要两次改变专业。1938年,郭永怀在西南联大求学。他目睹了日军飞机轰炸下满目疮痍的家园,痛感中国航空工业的落后,下定决心学习航空工程。他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光学专业,追随周培源改学航空工程。1960年当钱学森推荐他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祖国的召唤,再次改变专业,隐姓埋名,秘密投入“两弹”攻关,成为我国早期核武器研究的三大支柱之一。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让郭永怀热血沸腾。他的夫人李佩说:新中国一成立,老郭就坐不住了,开始准备回国。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成立的留美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和同胞一起筹划回国。但是师兄钱学森为了回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软禁,让他警觉起来。他以一个科学家特有的严谨和理性一步一步实施着回国的计划。为了回国,他拒绝了在美的保密协议上签字,并因此失去了加入美国机密项目研究的资格;为了回国,他放弃了已经在美国取得的优渥生活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他对康奈尔大学校方说:“我来贵校是暂时的,我想回去的时候就要走”;为了回国,他在朋友为他举行的野餐会上,当众销毁了自己十几年的科研手稿。终于,1956年9月他们一家三口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回国后,郭永怀第一时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总理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说,我想尽快开始工作。1957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回到祖国》,文章中他再次阐述回国的初心。他说:我作为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

永怀爱国之心

——纪念“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李波

祖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创新

在人类的航空航天史上有两次里程碑式的突破,其中第二次就来自郭永怀的贡献。

郭永怀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著名航空大师冯·卡门。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没有人敢于涉足的声障问题。航空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上世纪40年代飞机的速度已经接近了声速(每小时1200公里)。但是当人类试图跨越声障时,陷入了意想不到的“死亡漩涡”,飞机失去控制,出现了机毁人亡的惨剧。人们普遍认为,声速无法跨越。

郭永怀勇敢地选择了这一课题。四年后,1945年他完成了震惊世界的论文《跨声速不连续解》,从理论上回答了声障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1947年美国制造出人类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人类首次实现了跨声速的飞行。

1960年,郭永怀秘密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这些在我国是全新的领域,在国际上面临着美苏两个大国的封锁。在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中,他在原子弹的引爆方式上是用先进的内爆法还是使用枪法的争论中,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思路,大胆提出了用先进的内爆法为主要突破方向,从而优化了原子弹的结构设计,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在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中,他在没有经验、二没有参照的情况下,大胆提出了氢弹弹体的航条蒙皮结构,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为第一颗氢弹的空投奠定了基础。他的这一方案应用于整个第一代核弹的研制中。

求实

郭永怀深知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重实

际轻理论的时代,他和钱学森一起支持大力发展空气动力学基础研究,特别是对航空航天事业有重要意义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他作为筹备小组的副组长,以严谨的态度一手规划了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的建设发展方向,如今的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风洞群。而在力学所的高温气体动力学实验室已经发展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设的JF-2激波风洞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风洞,为我国的高超声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中,郭永怀担任场外试验委员会主任。场外试验涉及结构设计、强度计算、环境试验任务。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弹头设计、爆炸学的基本理论,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结构传力路线、气动特性、震动和冲击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大量试验,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方案。

奉献

回国后,郭永怀和妻子将在美国积攒的48460元全部捐献给国家。当时2000元就可以在北京买下一个四合院,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是二三十元。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反复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全部上交,生活是否会受到影响。他说:“完全没有问题,这本是人民的财产,再回到人民手中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对自己却十分苛刻,他的毛巾一直用到实在不能再用了才肯换新的。

1960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初期,郭永怀每天上午在力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九所参加核武器的研制。他和王淦昌、彭桓武一起在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打响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第一炮。那时的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试验,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长城脚下的试验工地,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火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郭永怀和科技工作者

进行了1000多次的炮轰试验。

1963年,郭永怀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迁往青海高原的221基地,开始了原子弹“草原大会战”。由于保密规定,他不能告诉妻子李佩,一度引起了妻子的误解。青海高原海拔3000多米,地处高原缺氧,空气稀薄,水煮不开,饭也煮不熟,最低气温零下40℃,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郭永怀和广大科研人员一起喝碱水、住帐篷,以惊人的毅力,集智攻关,完成了研制原子弹的壮举。

1968年9月20日他把唯一的女儿送上了去往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的火车,9月30日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3日,他再一次踏上了青海高原,为我国第一颗热核武器的研制做最后的准备。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他步履匆匆地登上了回京汇报的飞机。12月5日,飞机在即将于首都机场着陆时发生了意外,不幸坠毁。在他牺牲的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发射。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奉献。

协同

1956年回国后,郭永怀立即参与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担任力学规划组副组长,与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等科学家一起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他担任力学所副所长长达十年时间,那时候钱学森已经兼任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主要精力放在我国第一代导弹的研制上,所以力学所的工作主要是郭永怀主持。他和钱学森配合得非常融洽,被称为“卡门学派的中国兄弟”。

力学所的研究员睦璞曾问过郭永怀:“为什么您与钱学森所长从来没有不同意见,不是让着钱所长?”郭笑着回答:“他是师兄!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俩在一起时说。”钱学森对郭永怀也是一样的尊重,有什么问题都要问一问郭的意

见。正是领军人物的团结协作、互相配合,才使得我国的力学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的。

育人

郭永怀经常对学生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和你们以后的两三代人,要成为国家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的学生、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说:“我一生都把老师的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1956年,我国恢复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

1957年,他与钱学森、钱伟长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并担任了第二届、第三届班主任,为国家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力学人才,被称为力学界的“黄埔三期”。

郭永怀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958年,为了给新中国培养更多的航空航天人才,他和钱学森一起向中国科学院建议成立“星际航行学院”。这一建议直接催生了一所全新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诞生。

如今,他的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我国科技事业的栋梁之才,他们传承弘扬着郭永怀先生的精神,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



郭永怀领导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模型。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藏